

北宋哲学史

下 卷

石 训 姚瀛艇 刘象彬 李书增

李之鉴 卢连章 吴士英

吴家振 李保林 朱忠明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北宋哲学史

下 卷

石 训 姚瀛艇 刘象彬 李书增

李之鉴 卢连章 吴士英

吴家振 李保林 朱忠明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北宋哲学史（下）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黄河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 开本 9.5印张200 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3000册

ISBN 7—215—00135—0/B·15

统一书号2105·60

定价2.15元

目 录

第 四 编

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学派的 哲学思想

概说.....	(1)
---------	-------

第十一章	张载的哲学思想 (上)	(3)
------	---------------------	-------

第一节	张载的生平和著作.....	(3)
-----	---------------	-------

第二节	“太虚即气”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10)
-----	---------------------	--------

第三节	“一物两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22)
-----	---------------------	--------

第十二章	张载的哲学思想 (下)	(31)
------	---------------------	--------

第四节	“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的认识 论.....	(31)
-----	----------------------------	--------

第五节	“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 论.....	(35)
-----	----------------------------	--------

第六节	张载后学.....	(43)
-----	-----------	--------

第 五 编

以程颢、程颐为重点的唯心主义 道学家的哲学思想

概说.....	(55)
第十三章 周敦颐的哲学思想.....	(56)
第一节 周敦颐的生平和著作.....	(56)
第二节 “太极图说”的客观唯心主义本质.....	(63)
第三节 “诚”和“主静”的学说及其社会 作用.....	(76)
第十四章 邵雍的哲学思想.....	(87)
第一节 邵雍的生平和著作.....	(87)
第二节 “心无所不谋”的唯心主义自然观.....	(97)
第三节 “以物观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论.....	(111)
第四节 “加一倍法”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117)
第五节 “元会运世”的退化历史观.....	(123)
第十五章 司马光的哲学思想.....	(132)
第一节 司马光的生平和著作.....	(132)
第二节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的道学思想...	(134)
第三节 “僭天之分，必有天灾”的天命论和 神秘主义的象数学.....	(141)

第四节	“天地不易”的形而上学思想及其对 矛盾变化观念的利用……………	(145)
第五节	“善恶杂处”的人性论和“正心”的 认识论……………	(151)
第六节	司马光后学——范祖禹、刘攽、晁说之	(157)
第十六章	苏轼的哲学思想……………	(167)
第一节	苏轼的生平和著作……………	(167)
第二节	道生万物的客观唯心主义宇宙观……	(175)
第三节	“动而不息”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180)
第四节	“不说不观”的神秘唯心主义的不可 知论……………	(187)
第十七章	程颢、程颐的哲学思想(上)……………	(195)
第一节	二程的生平和著作……………	(195)
第二节	“天下只是一个理”的理本论……………	(201)
第三节	“格物致知”的认识论……………	(214)
第四节	“万物莫不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228)
第十八章	程颢、程颐的哲学思想(下)……………	(235)
第五节	“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	(235)
第六节	“法先王”的历史观……………	(250)
第七节	二程与周敦颐、张载的关系……………	(262)
第八节	二程后学——杨时、谢良佐……………	(271)
结束语	……………	(289)

第 四 编

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 学派的哲学思想

概 说

面对北宋社会的严重危机，许多有志之士纷纷上书，疾呼改革。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学派也提出了他们的改革主张。他们对王安石新法表示同情，但又认为它太激进，即直接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不敢积极支持。

张载是“关学”的创始人。他的弟子有吕大钧、吕大忠、吕大临、苏昞、刘公彦等人。与他交往密切，志同道合者有游师雄、李复、张舜民等人。由于这些人多从学张载于关中，故形成了“关学”学派。

“关学”学派的政治态度反映到学术思想上，表现为具有“杂”的特色。就张载的哲学思想来说，其自然观是唯物主义的，而且具有比较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但就其认识论、人性论的主导方面或归宿则是唯心主义的，而且提出了相当保守的政治伦理观。这两方面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

独特的自相矛盾的思想体系。这个特色，如果从“政治对哲学不能不有重大直接影响”（恩格斯语）上说，无疑地是恰当的。文化思想领域本身的状况对哲学面貌也有直接的影响。

第十一章 张载的哲学思想（上）

第一节 张载的生平和著作

张载，字子厚，北宋凤翔郿县（今陕西省郿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死于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因为家住在郿县横渠镇，并曾在横渠镇讲学，所以后来学者称其为横渠先生。

张载祖籍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他父亲张迪，在宋仁宗时任殿中丞、知涪州事，卒于涪州任上。此时，张载与其弟张戡均尚年幼，无力返回老家大梁，全家便侨居凤翔郿县横渠镇。因此，吕大临所写的《横渠先生行状》（以下简称《行状》）一文说他“少孤，自立”。

张载的少年时代，党项族所建立的西夏政权，常常侵略骚扰北宋的西北边境，北宋政府受到了内忧外患的困扰，人民生活也极端贫困，这些对于“慨然以功名自许”的张载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据《宋史·张载传》说，他“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想为国家解除西北边患贡献自己的力量。

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事，这时，年仅二十一岁的张载就来到延州，上书谒见范仲淹，建议于边境用兵。范仲淹“一见知

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宋史·张载传》）。张载读了《中庸》之后，很不满足，于是他又读了许多“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大经》。”（《行状》）可见，张载在研究哲学，探求知识，寻找真理的过程中所走的道路是迂迴曲折的，是在儒、道、佛三家中转来转去，最后从儒家“大经”中找到了归宿。而其中对他影响最大、最深的则是《周易》。王船山说：“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张子正蒙注序论》）王船山对张载哲学思想的评价，是非常恰当的。从张载的著作，特别是从《横渠易说》中，可以看到他受《易》的影响是很深的。他是以《易传》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因素为根据，在批判佛、道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这就是张载一生学术研究的道路。

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张载举进士，以后作了几任地方官吏。《行状》记载：“先生嘉祐二年登进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参军，迁丹州云岩县令，又迁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公事”（祁州今河北省安国县；丹州今陕西省宜川县；云岩今陕西省宜川县云岩镇；渭州今甘肃陇西县）。在这个时期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任云岩县令时的措施；二是在渭州的事迹。

张载作云岩县令时，十分重视改变社会风俗，培养社会道德，树立尊老事长的优良风尚。因此，《行状》叙述他在云岩的事迹说：“其在云岩，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每

以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由于张载重视教化的作用，因而使关中风俗为之大度，人民日益敦厚纯朴，社会道德日趋良好。他认为，对乡民百姓“有所教告”，单靠发布文告恐怕难以“尽达于民”。因此，他经常把乡长们召集到县庭，“淳淳口谕，使往告其里闾。间有民因至青庭或行遇于道，必问：‘某时命某告事闻否’，闻即已，否则罚其受命者”。张载办事认真，政令严明，所以“一言之出，虽愚夫孺子无不预闻知。”这就便于政令的推行。

宋神宗熙宁初年，张载被任命为著作佐郎，签书渭州军事判官。《行状》叙述他在渭州的情况说：“在渭，渭帅蔡公子正特所尊礼，军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从事，所以赞助之为多。并塞之民常告乏食而贷于官，帑不能足，又属霜旱，先生力言于府，取军储数十万以救之。又言戍兵陟往来，不可为用，不若损数以募士人为便”。张载和环庆经略使蔡挺的关系很好，并且得到蔡挺的信任、尊重。军府政事，蔡挺常常向他询问。张载也“夙夜从事”，尽力赞助。他对西夏的入侵很注意，《文集》有《贺蔡密学启》、《与蔡帅边事画一》、《泾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都是这时写的。他看到边境居民受到烧杀劫掠，加上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极端贫困和悲惨生活，除了深表同情外，又“力言于府，取军储数十万以救之”。张载的这些做法，对减轻人民的负担和痛苦都超过一定的作用，也说明他关心民间疾苦，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3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朝廷推荐张载，被神宗召见，任命为崇文校书。《宋史·

张载传》说：“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谋之，召见，问治道。对曰：‘为政不法三代，终苟道也。’帝悦。以为崇文院校书。”这里，他所说的“为政不法三代”即是指《行状》曾引张载的话说：“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意思是说，如果不解决贫富不均，教养无法的问题，就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求一时方便的苟且之道。这时，正是王安石执政，实行新法的时候。《行状》说：“他日见执政，执政尝语曰：‘新政之更，惧不能任事，求助于子如何？’先生对曰：‘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执政默然，所语多不合，寝不悦。”从这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之初，很想求助于张载，张载认为这次变法，“若与人为善”的话，他愿意合作，否则便反对。事实上，张载同王安石“语多不合，寝不悦”。因此，司马光的《哀横渠诗》说：“声光动京师，名即争荐延；真之石渠阁，岂徒修简编？丞相正自用，立有荣枯权；先生不可屈，去之归卧坚。”就是说张载与王安石的意见不一致。

张载作为中小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面对北宋王朝百孔千疮，内外交困的悲惨局面，要求改革当时的弊政，主张变通。他认为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只有“通其变，然后可久，故止则乱也。”（《横渠易说·既济卦》）他赞成变革，但反对“顿革之”。张载对王安石变法，既不象文彦博、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那样的激烈反对，也不完全支持这种“顿革之”的突变。在他看来，不变不行，变快了也不行，这就是他对王安石变法持消极态度的主要原因。

张载任崇文院校书不久，即被派往浙东去审查处理苗振的贪污案件。当时程颐上书说：“张载以道德进，不能使之治狱。”王安石回答说：“淑问如陶，犹且献囚，此庸何伤？”（《行状》）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张载案狱完毕，回到京师开封。这时他弟弟张戡因屡次上书反对新法，並和王安石面争，由监察御史里行，被贬为司竹监，张载感到恐惧不安，于是也就辞戡回到故居横渠镇。

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张载回到郾县横渠镇后，依靠家中的数百亩土地生活，整日读书讲学，研究学问，探讨问题，著书立说。《行状》说他是：“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张载经常“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教育学生。但是决不是单纯的修身养性，他却是非常重视“学以致用”的精神。二程曾经对张载说：“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庶几善学者。”张载说：“如其诚然，则志大不为名，亦知学贵于有用也。”（《河南程氏粹言卷第一》，《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6页）张载及其弟子注重研究兵法、井田、关心边事和改进内部治道，就是这种“学以致用”精神的具体表现。张载还注意自然科学的研究，如在天文学方面，他早年相信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的传统说法，以后也承认了地球自转，“地气中”，“顺天左旋”。他还纠正了传统的“天左旋，地右动”的观念，指出天地都是旋的，只是由于速度不同，从地面上看来，似乎与天运转的方向有些不一致。张载的这种“学以致用”的学风和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对他走上唯物主义的道路上，无疑是有积极影响的。也正因为此，他

经过多年的苦思考，潜心研究，终于在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秋天，写成了《正蒙》这部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正蒙》共分十七篇，是门人苏昞分类编定的。张载对这部著作极为重视，他对弟子们说：“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圣合与！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周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行状》）他的弟子们对《正蒙》一书也十分尊崇，把它奉为儒家的经典著作。杨时曾说：“《正蒙》之书，关中学者尊信之与《论语》等，其徒未尝轻示人。”（《杨龟山集》卷二十）《正蒙》）张载晚年的这部重要著作，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较大的影响。

张载在横渠镇讲学时，比较重视实际问题，关心民间疾苦。他看到北宋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和贫富不均的恶果，特别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土地给农民带来的痛苦。他“慨然有意三代之治”，以为“仁政必自经界始”（《行状》）。他研究田制，提出“均平”的思想，幻想把土地收归国有，恢复井田制度，以解决贫富不均等问题，从而缓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但是，另一方面，他却不敢触动大地主的利益。他在《经学理窟·周礼》中说：“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为富。借如大臣有据士千顷者，不过封与五十里之国，则已过其所有；其他随士多少与一官，使有租税人不失故物。”这种使富者“不失其为富”的办法，怎样作到“均平”，作到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呢？这只能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这一点加上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充分说明他在政治上最动摇不定的。

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吕大防上奏章，问宋

神宗再次推荐张载。吕大防说：“张载之学，善法圣人
之遗意，其术略可措之复古，乞召还旧戢，访以治体。”

（《行状》）张载再一次被召入朝，任同知太常礼院。张载就
戢不久，因与主管礼官意见不合，加之有病，便辞职回家。

张载和二程是亲戚，张载是二程父亲程珦的表弟，
比程颢年长十二岁，比程颐年长十三岁，是二程的
长辈。他们之间交往密切，感情很深。张载在回陕的行途
中，路过洛阳，与程颢、程颐晤谈。门人苏昞记载了这次谈
论，即《程氏遗书》卷十的《洛阳议论》。在洛阳议论中，
谈到井田设想，张载说：“必先正经界，经界不正，则法终
不定。”程颐回答说：“议法既大备，却在所以行之道。”
张载又说：“岂敢！某止欲成书，庶有取之者”。程颐对
答说：“不行于当时，行于后世一也。”由此可见，在井田
问题上，他们意见基本上是相近的。这也是张载在政治上保
守性一面的一个佐证。议论之中也谈到《周易·说卦》所讲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应该作如何解释的问题，他们的见解
就发生了分歧。《洛阳议论》记载：“二程解‘穷理尽性以
至于命’；‘只穷理便是至于命。’子厚谓‘亦是失太快，
此义促有次序’。”在这一方面，张载和二程的根本不同就在
于对“理”的理解。张载认为理即物之理，二程则认为理就
是最高的实体。

张载路过洛阳时，病情已经很重，路至临潼逝世。《行
状》说：“行次临潼，卒于馆舍，享年五十有八。”邵伯温
也说：“子厚入馆数月，以病归，过洛，……见二程先生
曰：‘某之病必不起，尚可及长安也。’行至临潼县，浴沐
更衣而寝，及旦视之，亡矣。”（《邵氏闻见录》卷第十

五)死后“贫无以敛，门人共买棺奉其丧还。”(《宋史·张载传》)

张载的一生，做官的时间不多，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讲学和著书。可以说是学者、教育家的一生。他一生的重要贡献是从理论上批判了佛教唯心主义，进一步发展了朴素唯物主义。

张载的著作，明代万历年间沈自彰搜集汇编为《张子全书》，以后刊行许多版本。1979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张载集》，比较完整，收集资料较为丰富。其中《正蒙》、《横渠易说》、《张子语录》、《经学理窟》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

第二节 “太虚即气”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张载承继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气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把气作为世界的本体，提出了“太虚即气”的哲学命题，并在批判佛、老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观。

佛、道唯心主义赋予“太虚”以绝对的“空”或“无”的含义，使“太虚”成了脱离物质世界的“绝对”。张载针对佛教唯心主义的“虚无”之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太虚即气”的命题，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赋予“太虚”以一种具体物质的含义，抛弃了在“太虚”问题上的神秘主义。张载认为，空若无物的太虚，即天空，并不是空无所有，而是气的本来状态。他说

“太虚者，气之体”（《正蒙·乾称》）“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正蒙·太和篇》）

在他看来，“气”的存在分为“聚”、“散”两种状态。这两种状态是“气本之虚则湛，一无形。感而生则聚而有象。”（《太和篇》）这就是说，“气”在“散”的状态下，是无形体无形象的，因此，人们不能用眼直接看到它。在“聚”的状态下，才有了形体和形象，人们才得以直接看见。无形体状态的“气”比“聚”的状态的“气”更为根本，所以张载说：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太和篇》

“本体”指本来的状态，即气及有变成具体事物时的状态。

“客形”指暂时的形态。这是说，无形的太虚是气的本来状态，而气的聚散则是暂时的变化形态。气和太虚是永恒的、不生不灭的。因此，无形的太虚就不是绝对的虚无，而是散开来的气。而万物则不过是气凝聚的不同表现罢了。“大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正蒙·太和篇》）聚则有形，散则无形。气的聚散只有明显和幽暗的差别，及有有和无的区分。他用水和冰的关系说明太虚和气的关系：水凝则为冰，冰释则为水；太虚聚则为气，气散则为太虚。最后他得出结论说：

“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同上）显然，太虚就是气，即有绝对的虚无。这就从根本上同佛老神秘的“虚无”划清了